

古罗马共和时期的阶级斗争与反高利贷立法

意大利 里卡尔多·卡尔迪里

(罗马第二大学 法学院,意大利 罗马)

摘 要: 在古罗马共和时期,反高利贷是贵族与平民之间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民的诉求首先表现为解放因未清偿债务而沦为债务奴隶的债务人,后来平民对违反利率限制的高利贷者享有拘禁之诉的诉权,而后者要承担四倍罚金的惩罚。斗争的双方认为,求助于法律是平衡彼此利益的唯一理想途径。《十二表法》规定了利率不得超过 1/12,公元前 357 年颁布的《杜伊流斯和梅奈纽斯平民会决议》重申了《十二表法》的规定,公元前 347 年的平民会决议把允许的最高利率降低了一半,后来的《格努斯平民会决议》完全禁止利息,这些法律大部分是平民自己的立法机构制定的公法。

关键词: 古罗马;共和时期;阶级斗争;反高利贷

中图分类号: D90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14)01-0081-11

一、债务问题和平民的诉求

在古代历史编纂学中,自公元前 494 年第一次平民撤离开始,债务问题就与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与土地问题一样,债务问题因经常在原始文献中出现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①虽然平民的诉求和要求不止一次地被纳入既有的法律框架和由此产生的“屈从形式”,但隐藏在文学性原始文献术语中的平民的诉求并没有被准确地发现,这导致了在法律层面上准确讨论平民债务问题的困难。^②

对此,我认为区分两种不同的面向是有益的。一方面是早期市民法允许作为“债权人”的家父防止其债权不被满足而采取的法律措施,例如担保、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是适于维持债务关系形式

收稿日期:2013-10-30

作者简介:里卡尔多·卡尔迪里(Ricardo Cardilli),男,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法学院教授。

^① 这在理论上得到了充分的关注。例如,F. DE MARTINO,“Riforme del IV sec. a. C.”,载 *BIDR*1975 年第 78 卷,第 29 页及以次和第 39 页;又如,F. SERRAO 在 *Diritto privato economia e società nella storia di Roma I. Dalla società gentilizia alle origini dell'economia schiavistica*(那波利,2006 年)第 345 页重拾 G. DE SANCTIS 在 *Storia dei romani*(佛罗伦萨,1960 年第 2 版)第 1 页及以次,尤其是第 6 页中质疑和批判的传统。

^② 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引起注意,而是观察者的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在史料所记载的关系的实质,忽略了史料中所使用的术语。G. Maccormack 的“nexi,iudicati and addicti in lvy”(载 *ZSS(RA)*,第 84 卷,第 350 页及以次)一文通过将针对受判处者提起的拘禁之诉引入《十二表法》,模糊地意识到在李维所使用的不同术语中,有一种与债务口约历史相关的可能的历史发展过程。L. Pepe 在其 *Studi sull'esecuzione personale I. Debiti e debitori nei primi due secoli della repubblica romana*(米兰,1981 年)第 108 页对上述观点表示不解,他主张在正确的方法论基础上对所涉及的文学性原始文献做更深入的研究,例如与阶级和谐相关的复杂传统。

的法律规定。事实上,这两个面向在现实中可能是相互影响的。

根据原始文献,第一种面向的法律方案可以追溯至债务口约是毋庸置疑的。^①事实上,它要求作为贷方的家父对债务奴隶的人身采用某种限制“形式”^②,这是一种实现屈从于其他家父权之功能的法律工具。债务口约和拘禁的关系、债务奴隶和受判处者以及被裁交原告者地位之间的关系使画面变得更加复杂。^③这再次突出了文学性原始文献中的法律术语问题。^④此外,这些术语记载着平民围绕限制借贷利息^⑤的斗争,尤其是斗争的工具——法律和平民保民官。

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塔西佗《编年史》记载的可靠性,而他的记载几乎是历史编纂学在该问题上的结论,^⑥并且得到了其他原始文献的佐证。

二、塔西佗《编年史》第六卷和“罗马自古以来反对高利贷”的命题

在《编年史》第六卷中,塔西佗记载了公元 32 年至 37 年的历史,这涉及提贝留斯统治时期。在公元 33 年,他记载了一次债务人反对继续以独裁官凯撒的法律^⑦所禁止的利率放贷的高利贷者

① 关于这个复杂问题的不同见解,参见 PH. E. HUSCHKE, *Über das Recht des nexum und das alte römische Schulrecht*, Leipzig: Gebauer'sche Buchhandlung, 1846 (rist. Aalen, 1980); L. MITTEIS, "Ueber das Nexum", ZSS(RA), 1901: 96ss.; O. LENEL, "Das Nexum", ZSS(RA), 1902: 84ss.; TH. MOMMSEN, "Nexum", ZSS(RA), 1902: 348ss.; B. KÜBLER, "Kritische Bemerkungen zum Nexum", ZSS(RA), 1904: 254ss.; U. VON LÜBTOW, "Das altrömische nexum als Geiselschäft", ZSS(RA), 1936: 234ss.; U. VON LÜBTOW, "Zum Nexumproblem", ZSS(RA), 1950: 112ss.; H. LEVY-BRUHL, *Nouvelle études sur le très ancien droit romain*, Paris: Recueil Sirey, 1947, pp. 97ss.; M. KASER, *Das altrömische Ju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49, pp. 232ss.; M. KASER, *Das römische Privatrecht, I*, München: C. H. Beck, 1971, pp. 166-167.

② 相较处在受役状态的人(为了脱离家父权,解放行为的实施是必要的)和被裁交原告的人(可被卖于台伯河对岸),债务奴隶不同的屈从形式可以证明这一点,差异性也体现在解放因称铜式清偿而沦为债务奴隶的具体套语中。

③ 从解释的角度,我认为称铜式清偿在《十二表法》之前具有解放债务奴隶的功能,根据《十二表法》,被裁交原告和被拘禁之前,在法定宽限期的第 30 天允许受判处者脱离债的约束。参见 "Lege XII tabularum praeposita iungitur interpretatio", 载 *Homenaje Hiestrosa I* (波哥大, 2003 年) 第 199 页及以次,特别是第 219 页及以次。

④ 这一点参见 L. PEPPE, *Studi sull'esecuzione personale*, 第 102 页及以次。李维《罗马史》中的有关片段,可参见 M. TALAMANCA, "Obbligazioni(diritto romano)", 载 ED1979 年第 29 卷,第 5 页注释 27, 这些可能依然是“非常具有普遍性的法律结构问题”。

⑤ 关于术语,经查证 faenus 比 usura 更早用来指称利息。Sexti Pompei Festi De verborum significatu quae supersunt: Cum Pauli epitome(Lindsay 主编) 第 76 页第 9 行: 利息(fenus), 放高利贷者(feneratores) 和关于金钱借贷利息的法律(lex de credita pecunia fenebris)。之所以被称为借贷,是因为产生另外的金钱债权,希腊人将同样的事情称为 tokòj。这种观点可以在瓦罗《论拉丁语》(第 5 卷第 36 节)中关于铸币及其与铜、阿斯和盎司关系的论述中找到。关于(借贷的)自然起源问题以及由此对金钱借贷带来的隐喻,请参阅我在 "Il 'periculum' e le 'usurae' nei giudizi di buona fede"(载 S. TAFARO 主编, *L'usura ieri ed oggi*, Convegno Foggia 7-8 aprile 1995, 巴里, 1997 年, 第 13-19 页)一文中明确指出的与当下观念不同的古代法学家的观点,以及在 "Dalla regola romana dell'usura pecuniae in fructu non est agli interessi pecuniari come frutti civili nei moderni codici"(载 *Roma e America. Diritto romano comune* 1998 年第 5 卷)一文中讨论这一问题的历史和学理发展过程。

⑥ 这里,塔西佗只谈到了法律(lex),可能简化了凯撒在公元前 49 年采取的和公元前 47 年法律有关的措施的历史复杂性。与塔西佗《编年史》(6, 16, 1)有关的问题,详见 E. KOESTERMANN: *Cornelius Tacitus, Annalen*(第 2 卷), 海德堡, 1965 年, 第 277 页。对公元前 49 年的措施与关于金钱消费借贷的优流斯法关系的广泛深入研究,参见 A. SACCOCCIO, "Un provvedimento di Cesare del 49 a. C. in materia di debiti", 载 S. TAFARO, *L'usura ieri ed oggi*, 第 99 页及以次。此外,公元前 44 年在马库斯(Matius) 致西塞罗的信中所展示的当时状况与凯撒颁布法律时几乎没有什么不同(Cic. ad fam. XI, 28, 2)。

的暴动。^①

根据塔西佗的记载,古罗马人反高利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大执政官之前的时期“罗马自古以来就反对高利贷,高利贷是叛乱和不和的经常源泉,甚至在较早的道德还未堕落的社会里,人们已经对它采取限制措施了。”(《编年史》VI,16,1)

罗马人反对高利贷的古老性在共和晚期再次被强调,李维记载的公元前494年第一次撤离运动之前的平民骚动^②和十大执政官之后的时期推动反高利贷措施出台的反复骚动佐证了这一观点。讨论“引起叛乱和不和”的问题是有意义的,它不仅与平民的撤离相关,也与共和晚期贵族所重视的阶级和谐^③和歌颂道德未堕落的古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关于十大执政官之前时期的债务关系法,基于针对受判处者提起的拘禁之诉和《十二表法》,在理论上人们推测承担“责任”的债务人的处境可能会更加悲惨。在这一时期,债务口约的实质可被具体化为一种债务奴隶自发地“屈从”于作为放贷方家父的形式^④,由此产生了一种不具有《十二表法》第三表第1条至第3条所规定的执行程序特征的具体“责任”形式。^⑤就《十二表法》而言,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对不履行到期债务的债务奴隶来说,作为受惩处者要受制于其规定的拘禁之诉。^⑥

无论如何,债务口约和被裁交原告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这导致平民宁愿委身于债务口约,而不是等待“债权人”的拘禁和随之而来的被裁交债权人。即便在上述理论中也是如此。^⑦然而,这依然没有回答债务人负债的法律形式问题。李维所使用的上述术语是明确的,直到《十二表法》时期一直使用债务奴隶。^⑧

我认为,术语的明确性得到了在早期法中使用 uncia(意思为盎司,也即1/12阿斯——译者注)这一专业术语指称金钱因借贷而增加的数额的佐证。放贷的金钱数额与增加的数额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定比例的标准阿斯(阿斯是当时的重量单位)。^⑨从抽象的角度看,这既不是数量巨大的也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在具体情形下“商定的”交换价值,首先取决于铜块,其次是铜铸币,并且

① 塔西佗《编年史》(VI,16,1):此时,大批的控诉者又把愤怒指向那些通过放高利贷而增加自己财富的人身上,因为这些人的行为违反了独裁官凯撒通过法律为借贷和在意大利占有土地规定的条件。由于公共利益被置于私人利益之下,所以这项法律很久以来就被人们抛弃了。我认为不应该将一件因为独裁官凯撒在法律技术上非常粗糙的东西归咎于塔西佗,因为这里没有提及公元前49年或者公元前47年法官的职责。并且就其本身来说,这在法律上也不应该被忽略,尽管在此期间授予法官职权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传统的最长6个月一次到每年一次,再到每十年一次。公元前49年至公元前44年的情况,参见S. TONDO, *Profilo di storia costituzionale romana*(第2卷),米兰,1993年,第180-187页。

② J. IMBERT, “Fides et nexum”,载 *Studi in onore V. Arangio-Ruiz*, I, 1953年,第359页及以次; F. HORAK, “Kreditvertrag und Kreditprozeß in den Zwölftafeln”,载 *ZSS(RA)* 1976年第93卷,第264页。对此,查证与生活在奴役状态的人是否存在关联是有趣的。关于这一点以及与被裁交原告者的关系,参见R. FIORI, “Servire servitutem”,载 *Iuris vincula. Studi in onore M. Talamanca*, II, 那波利,第355页及以次。

③ 两者的共同点, M. TALAMANCA(*Obbligazioni*, 第6页注释35)指出“根据十大执政官之前的时期的观念,若有问题的话,唯一可能的‘标的’是债务奴隶的人身”。C. ST. TOMULESCU(*Nexum bei Cicero*, 载 *Iura* 1966年第17卷)有不同的观点,他强调债务口约的“标的”是债务人的行为。

④ 从这个角度看, J. IMBERT(*Fides et nexum* 第362页)对 M. KASER 观点(*Das altrömische Jus*, 哥廷根, 1949年, 第240页及以次)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十二表法》之后,债务口约使针对受判处者和受惩处者的拘禁合法化的可能性,改变了称铜式清偿(相对于其在十大执政官之前作为债务口约解除的角色)在执行程序中的功能。我的观点,参见 *Lege XII tabularum* 第219页及以次。

⑤ G. MACCORMACK: *Nexi* 第351页,虽然后来他推论出被裁交原告的确切效果,但 L. PEPPE(*Studi sull'esecuzione personale*, I 第108页)并不认为如此。

⑥ 关于这一点, F. DE MARTINO(*Riforme del IV sec. a. C.* 第53页)认为在十大执政官时期只有普通物品的借贷,并指出相当于1/12标准阿斯的盎司与借贷的收益是毫不相干的,可能需要一种更重的重量单位。

还需要用称去称重量。在此重要时刻,不仅要“交易”价值较大的物,还要确定买受人提供的铜的具体重量。^①

通过将上述关系固定为标准阿斯重量的 1/12,古老的 *fenus unciarium* (1/12 的利率) 短语比较符合通过誓约行为的方式成立债务关系并产生“屈从于”放贷人家父权效果的债务口约的运作过程。在这一行为中,金属(铜)被称重后通过称而交付(起初是实际交付,后来是象征性交付)。^②

自开始至对利息进行限制这一时期,平民的斗争是以解放债务奴隶为中心的,这也是《关于债务奴隶的佩特流斯和帕皮流斯法》之前的主要政治议题。^③ 主要受大祭司的解释而塑造的市民法体系的一部分,以及限制最高利率的公法或平民会决议的颁布,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平民的选择似乎意味着不可以讨论履行行为的合法性,并且唯一可行的道路是对超过法律规定限度的债务口约(参见下文)规定多倍罚金,即确立以潜在的惩罚阻止高利率的间接形式。

三、反高利贷立法及法律责任

(一) 反高利贷立法

1. 1/12 的利率与《十二表法》

在《十二表法》中,规定了 1/12 的利率限制,但这仅被塔西佗《编年史》(VI,16,2) 清楚地记载了下来。在理论上对这一记载是有质疑的^④,即使对限制利率没有争议,对利率也有不同的解读。我认为如果考虑得到考古发现佐证的塞尔维尤斯·图留斯时期的铸币和历史现实,^⑤ 意欲强调公元前 5 世纪的经济条件和货币性质的年利率为 100% (*uncia* 意为每月 1/12 阿斯) 的观点^⑥ 就失去了说服力。我认为,在《十二表法》时期 *uncia* 意味着年利率为 1/12 阿斯(每年 10 个月) 即 8.33% 是有说服力的。^⑦ 另外,年利率为 100% 的观点使原始文献中记载的平民斗争的理由变得不可理

① 重要的文献有 G. DE SANCTIS: *Storia dei romani* 第 457-459 页。公元前 5 世纪的铜币问题,参见 A. MANFREDINI “Tre leggi nel quadro della crisi del V secolo a. C.”,载 *Labeo* 1976 年第 22 卷。L. SOLIDORO 在 *Problemi di storia sociale nell'elaborazione giuridica romana* (Appunti dalle lezioni) 一书(第 13 页及以次,特别是第 25-27 页) 中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一方面他认为 1/12 的利率符合公元前 5 世纪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他认为应当重新解释年利率 100% 的含义。但无论何种解释,都很难与金钱借贷相协调,也不能与普通物品的借贷完全一致。

② 参见 M. KASER, *Das römische Privatrecht*, I, 慕尼黑, 1971 年第 2 版, 第 167 页。在债务口约的标准程式套语中包括 1/12 的利息加入偿还数额的观点,参见 M. KASER, *Das altrömische Jus*, 第 239 页。对债务口约双重功能的介绍,参见 B. ALBANESE, *Gli atti negoziali*, 第 38 页。Festus 在 *De verb. sign.* (162, 4-5 L.) 证实了金钱要式口约和金钱之债的关联。

③ 言其主要而不是唯一,是因为原始文献中还记载了在特定时期的其他解决平民债务问题的尝试: 首先是公元前 367 年的《关于债务的李其纽斯和塞克斯求斯法》,规定将已经支付的利息抵作本金; 其次是公元前 352 年的《关于银行五人委员会任命的方法》,尝试依靠银行五人委员会的公共关怀。参见 A. POLLERA “Un intervento di politica economica nel IV sec. a. C.: lex de creandis quinqueviris mensariis (352 a. C.)”,载 *Index* 1985 年第 12 卷,第 477 页及以次,引文出自第 454 页。

④ F. DE MARTINO (*Riforme del IV sec. a. C.* 第 53 页) 依据公元前 4 世纪特别是公元前 5 世纪的经济状况提出质疑。对于塔西佗记载的可靠性, F. WIEACKER (*Zwölftafelprobleme*, 载 *RIDA* 1956 年第 3 卷, 第 478 页注释 43) 也持谨慎的观点。G. ROTONDI 在其 *Leges publicae populi Romani* (米兰, 1912 年) 一书的第 99 页并没有将十大执政官的规定列入高利贷法,但在《杜伊流斯和梅奈纽斯法》的部分谈到了塔西佗的记载和已失效的禁令(第 222-223 页)。

⑤ 这一观点得到了 C. APPLETON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u prêt à intérêt à Rome. Le taux du 'fenus unciarium'*, 载 *RHD* 1919 年第 43 卷, 第 467 页及以次) 和 F. WIEACKER (*Zwölftafelprobleme*, 第 478 页) 的有力支持。后来, F. DE MARTINO (*Riforme*, 第 62-65 页) 重新考察了支持这一观点的论据。最近的研究成果,还可参见 L. SOLIDORO, *Problemi di storia sociale*, 第 26 页。

解,尤其是将法定最高利率降低一半也就是 $1/24$ 不可解。^① 此外,还有如下理由证明这些质疑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其一是塔西佗的怀疑态度。^② 正是对静态的约定俗成的传统的不信任,使其对早期少数派观点的记载是可信的。^③ 其二就法学领域而言,关于法律起源的记载是非常明确的。

在《编年史》(III,26,3-4)^④中体现了这一点。一方面,人们感觉到与其他传统观点有相同之处。^⑤ 另一方面,与李维不同,塔西佗显然对授予塞尔维尤斯·图留斯主要立法者的角色有不同意见。^⑥ 然而得出的结论不应该抹黑塔西佗,而应该转向强调其他传统。该传统认为,塞尔维尤斯·图留斯在库利亚通过了一部使一系列王权法(据一种晚近的观点,本质上是帕皮留斯市民法)^⑦生效的根本法,这些王权法不同于汇集具有神圣仪式的努玛法。《编年史》(III,27,1)^⑧记载了作为自由与和睦的领导者的十人委员会并认为《十二表法》是最后一项公平立法。在此,塔西佗同样采用了少数派的观点。^⑨

理论上,塔西佗《编年史》(IV,16,2)经常与如下片段结合起来“盗贼处罚两倍,贷款取利者四倍,我们的先人持这种观点,并这样写在法律中。从而可以断定,贷款取利者是比盗贼坏得多的市民。”(加图《农业志·前言I》)

① 所以 F. DE MARTINO(*Riforme del IV sec. a. C.*,第64页)在阿普尔顿理论(*teoria dell'Appleton*)即历史神秘主义的背景下讨论法定最高利率降低一半的问题。

② R. SYME 的 *Tacitus*(第1卷)(牛津,1958年,1993年重印)第378、397页及以次谈到“怀疑”是历史学者的基本素质。

③ 但是当公正不复存在、野心和暴力代替了谦逊和克己的时候,专制制度就在许多国家成了永恒的现象。有一些城市,或者从最初的时候起,或者是在对国王的统治感到厌倦之后,决定改行法治。最早类型的法治是头脑简单者的朴素的创造物,其中最著名的可以举出克里特的弥诺斯、斯巴达的吕库尔戈斯和雅典的梭伦所制订的法律。梭伦的法律比较深奥,也比较丰富。在我们这里,罗慕路斯的专制统治结束之后,努玛把宗教的束缚和一部神圣的法典加到我们头上。还有一些法律是图鲁斯和安库斯制定的。然而塞尔维尤斯·图留斯是主要的立法者,王也要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译文来自塔西佗《编年史》(上),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54页。译文略有改动——译者注)

④ 西塞罗《论共和国》(II,1,2):(卡托)常说,我们的国家政体之所以优于其他国家,是因为在那些国家里差不多都有过这样一些人,他们各自以自己的立法和规章建立国家,例如克里特人有弥诺斯,斯巴达人有吕库尔戈斯,雅典人——他们的国家经常变化——起初有提修斯,后来有德拉古、梭伦、克利斯特涅斯等,最后学识渊博的法勒隆人得墨特里奥斯勉强维系住业已衰弱、濒于崩溃的国家。然而相反,我们国家的存在不是靠一个人的智慧,而是靠许多人的智慧,不是由一代人,而是经过数个世纪,由数代人建立的。他说,因为从来也未曾有过这样的天才,以至于当他在世的时候,任何事情都没有能躲过他的注意;即使所有的才能都集中于一个人,此人也不可能同一时间里表现出如此敏锐的洞察力,以至于无需长期的经验积累,便能领悟一切。(译文来自《西塞罗文集(政治学卷)》,王焕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51-52页。译文有改动——译者注)

⑤ 李维在《罗马史》中将作为神圣立法者的努玛和作为将所有市民按照财富多寡分为不同等级的奠基者的塞尔维尤斯·图留斯区别开来。塔西佗对塞尔维尤斯的特殊评价,参见 E. KOESTERMANN, *Cornelius Tacitus, Annalen*(第1卷),第466页。

⑥ 参见 D. MANTOVANI, “Le due serie di ‘leges regiae’”,载 *Istituto Lombardo (Rend. Lett.)*, 2002年,第136卷,第59页及以次,特别是第66页关于塞尔维尤斯·图留斯的部分。

⑦ 在高傲者塔克文被逐以后,平民为了遏制贵族的跋扈,采取了许许多多的措施来保卫自身的自由和确立相互间的团结。他们成立了十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吸收了各国制度的菁华而制订了《十二表法》,这是最后的公平立法。(译文来自塔西佗《编年史》(上),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54-155页。译文略有改动——译者注)

⑧ 参见 E. KOESTERMANN, *Cornelius Tacitus, Annalen*(第1卷),第467页。关于十人委员会,参见我的文章“*I Decemviri legibus scribundis come ‘poteri costituenti straordinari’ in Theodor Mommsen*”,载 *Fides Humanitas Ius. Studii in onore L. Labruna*(第2卷),那波利,2007年,第756页及以次。在理论上,曾假定塔西佗的“最后的公平立法”与李维《罗马史》(3,34,3)中的“*iura aequasse*”存在关联,参见 A. SCHIAVONE, *Ius. L'invenzione del diritto in Occidente*, 都灵,2005年,第419页注释52。

加图的记载很好地反映了罗马人的观念与现代人的不同。^[8] 在理论上,人们认为加图报道的“在法律中”和关于罚金的记载证实了塔西佗的说法。^[9] 相反,有学者认为从“在法律中”可以推导出两份原始文献之间的矛盾。^[10] 根据李维《罗马史》(VII,16,1)关于公元前357年《杜伊流斯和梅奈纽斯平民会决议》的记载和帕多瓦历史学家(即李维,因为李维是帕多瓦人——译者注)的观点,原始文献之间的矛盾是可以化解的。^①

我认为,加图的记载暗示了事实的复杂性。

首先,有学者认为,“在法律中”不存在一种合适的结构指称共和时期最后两个世纪罗马人头脑中的《十二表法》。这也得到了加图的反证,其在《起源》中明确地使用了公法这一表达概念。^[11] 《农业志》文本的多元性印证了作为反映利息问题的立法的复杂性。实际上,在加图的“在法律中”,人们可以隐约看到逐渐确定利息限度的不同立法。此外,这一论断也得到了其他相关历史事实的证实。

其次,加图认为古人在盗窃和放高利贷之间具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其目的在于谴责后者。^② 这种相似性,建立在对非现行盗窃的两倍罚金(《十二表法》第8表第16条)和对高利贷者的四倍罚金的对比上。如果“在法律中”这种相似性是存在的,那么在十人委员会时期的早期立法中就是具体可见的。

这里,加图“在法律中”这一表达也指称(但并不唯一)塔西佗记载的十人委员会颁布的法律是符合逻辑的。这构成了一幅展示法律规定对超过法定利率(首先是1/12的法定利率,然后是1/24,最后是绝对禁止利息)的部分课以四倍罚金的历史变迁图景,但并没有记载推动历史变迁的关键人物。虽然,加图在这一案例中强调制度及其连续性(我们的先人持这种观点,并这样写在法律中),但其与历史上得到颂扬的贵族精神和任一神话信仰的关系是需要讨论的。^[12]

2. 《杜伊流斯和梅奈纽斯平民会决议》及其与塔西佗《编年史》(6,16,2)的关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塔西佗《编年史》(6,16,2)记载的十人委员会做出的1/12利率的限制,是李维记载的公元前357年的《杜伊流斯和梅奈纽斯平民会决议》的前奏。^③ 在该决议中,“平民保民官马尔库斯·杜伊流斯和路求斯·梅奈纽斯提出的关于1/12利息法案不是同样地令贵族满意,而平民对它却相当欢迎”(《罗马史》VII,16,1)

我认为对这一记载的质疑是毫无根据的。首先应该注意公元前357年的平民会决议是在《关于债务的李其纽斯和塞克斯求斯法》颁布之后的第十年颁布的,后者的目的在于解决经历高卢火

① 对加图提及的法律是《十二表法》存在质疑,除了C. APPLETON, *Contribution* 第534页及以次,还可参见F. DE MARTINO, *Riforme del IV sec. a. C.*, 第49-50页。

②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应当轻视这种相似性,相反,它反映了一种高利贷观念,这种观念对现今的认识提出了问题并使其受到质疑。

③ 参见F. DE MARTINO, *Riforme del IV sec. a. C.*, 第49页及以次。该作者认为根据当时的经济性质,塔西佗的记载不具有可信性。然而,这位伟大的学者认为李维的记载并不比塔西佗的记载更可信,因此仅仅依据文本并不能解决问题。也有观点认为人们后来废弃了十人委员会的禁止措施。然而我不认为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该解释认为从《十二表法》到《杜伊流斯·梅奈纽斯平民会决议》期间通过重申高利贷禁令,人们在法律上确立了更严厉的限制措施。后一观点的持有者被收录在F. KLINGMÜLLER, *Fenus*, 载 *PWRE* 第6卷第2期,第2188页。最近又有学者主张这种观点,参见L. SAVUNEN, “Debt Legislation in the Fourth Century BC”, 载U. PAANANEN等主编: *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 Studies in Roman Republican Legislation*, 赫尔辛基, 1993年, 第143页及以次, 特别是第148页。事实上,这种解释反映了法与法律的关系,而后者是依据当今法律在整个法的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所理解的法律,但这并不适合于理解罗马尤其是罗马早期的现实,那时法的发展以及法与法律的关系,与当今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参见F. GALLO, *Interpretazione e formazione consuetudinaria del diritto. Lezioni di diritto romano*, 都灵, 1971年, 第92页及以次、第121页及以次;

烧罗马城之后的平民的沉重债务负担,方法是将已经支付的利息充抵本金,余下的金额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偿付。^[3]公元前352年,人们尝试通过《关于任命银行五人委员会的方法》这一不同的道路解决平民的沉重债务问题。^①在这些年中,平民的债务是非常沉重的,人们感觉到需要在平民会决议中以书面的形式重申并确定利息不得超过1/12的禁令,没有考虑到该禁令与对十人委员会是否确定利率限制的质疑之间的关联。

在这里对重复立法问题展开讨论是不合时宜的,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如同在申诉法律中那样准确分析不同立法背景和规则内容的细微差别而解决。^[4]将法律与法的关系建构为一种动态的关系是重要的,平民在政治上诉诸平民会决议和法律推动法变革的动力,与贵族通过坚守市民法和大祭司的解释维持现状的利益之间的关系具有辩证的特征。^②贵族和平民的“冲突”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走向“制度化”——首先围绕是否解散十人委员会^③,然后是公元前449年的《瓦勒流斯和奥拉求斯法》。这在长时期内表现为“秩序”(法)与“骚乱”(事实)之间的冲突,演变为从内部推动法发展的动力因素。在现代人的观念中,这种冲突除了被认为是对现有秩序的破坏和可能颠覆(革命)外,有时被解读为对法定秩序的潜在侵扰和当权者在处理骚乱和冲突上的无能。^[5]然而罗马人并不这样认为,在他们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矛盾中,他们的法披上了贵族与平民冲突的“外衣”,这种冲突作为法发展的动力在历史、政治和法律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公元前449年的《瓦勒流斯和奥拉求斯法》中体现的执政官治权与平民保民官“否决权”之间的冲突一样。^[6]

李维所依赖的传统,在其提到平民保民官马尔库斯·杜伊流斯和路求斯·梅奈纽斯提议制定禁止高利贷的平民会决议并且遭到贵族明确反对时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可以想象,一方是坚持维持债务和要求偿债的市民法体系以及具有相似功能的大祭司法律解释,另一方是平民要求限制此等屈从形式的政治意志。

因此,我认为《杜伊流斯和梅奈纽斯平民会决议》具有历史可靠性,并且其与塔西佗所记载的历史传统并不矛盾。

3. 公元前347年的平民会决议把最高利率降为1/24

塔西佗还注意到历史上有一个不是很明确的保民官的法案,该法案将可以主张的最高利率降低了一半“后来,保民官的法案又把利率降低了一半。”(《编年史》VI,16,2)这得到了李维《罗马史》(VII,27,3-4)中关于公元前347年的记载的确认。

罗马城里和边界的这种宁静,一直延续到提图斯·曼流斯·托尔夸图斯和盖尤斯·普劳求斯执政年。只是利率由1/12变成为1/24,并且使支付本身均等地分为三年,但第四部分必须立即支付。这样的协定对于部分平民来说是沉重的,但是与个人的困难相比,元老院更关心的是社会诚信。使状况变得特别轻松的是由于这一年既没有征税,也没有招募军队。

这一事件的意义在于对利率的限制还是由平民会决议规定,并且还涉及《李其纽斯和塞克斯求斯法》规定的债务分期支付的问题。对李维来说,这一事件并没有消除人们对是否与贵族达成协议疑问,后者可能间接地抵制了这个决议,因为该决议并没有减轻诚信平民债务人的负担(可能是因为要求债务的第四部分必须立即支付),这得到了帕多瓦历史学家的确认,后者认为元老院的多数成员更关心的是社会诚信,而不是平民的困难。

① 关于任命的具体方法,可以参见 A. POLLERA, *Un intervento di politica economica nel IV sec. a. C.*, 第447页及以次。

② 我的观点,参见 *Lege XII tabularum praeposita iungitur interpretatio*, I, 第201页及以次。

③ 我曾经试图证明不同历史建构的可能性,参见 *I Decemviri legibus scribundis come 'poteri costituenti straordinari' in Th. Mommsen*, 第755页。

无论如何,将作为利率计算单位的 *uncia* 减少一半证明(而不是否认)在金钱借贷中以 *faenus unciarum* 计算的年利率应为 8.33%。^①

4. 完全禁止有息借贷和《格努斯平民会决议》

塔西佗《编年史》(VI,16,2)记载“最终完全禁止利息。”对他的记载有很多的讨论和争议。^[7]关于这一点的记载可能并不准确,人们可以通过李维关于公元前 342 年的记载明确地得出这一观点“除此而外,我还发现有些作家提到,平民保民官路求斯·革努斯向平民提议立法禁止有息放债。”(《罗马史》VII,42,2)

同《杜伊流斯和梅奈纽斯平民会决议》一样,这一法案也是由平民保民官路求斯·革努斯提议制定的平民会决议,该决议完全禁止利息。阿庇安《内战记》I,54)也记载了一部“颇为古老的法律”,但从他的措辞中好像不能得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禁令。^[8]无论如何,与利率禁令的法律后果有关,我认为澄清不同原始文献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在实现阶级平等之前平民会决议干预利率的性质是有意义的。^②

(二) 法律责任: 四倍罚金和拘禁

正如已经看到的,加图《农业志》的前言中提到了与私诉有关的四倍罚金,他试图通过“法律中的惩罚”这一表达让人联想到为反对高利贷者而直接诉诸于拘禁。

在两倍罚金的次生诉讼(*litiscrescenza*)中,四倍罚金在理论上可以被理解为两倍的两倍:首先,如果债务人拒绝支付在已缔结的交易中确定的超过法定最高利率(先是 1/12,然后是 1/24)的利息额,由于利率禁令的次完全法律(所谓次完全法律是指违反时仅行为人应受制裁,行为效力不受影响者——译者注)性质,债务人被认为向放高利贷的债权人支付了两倍于超额利息的金额;其次,根据法律规定的对高利贷者的惩罚,如果人们拒绝直接返还已经支付的超额利息,同一债务人应从后者获得两倍于其未支付的超额利息,也就是四倍。^[9]我认为这种解读将问题复杂化了,认为所有人身受限制的债务奴隶都拒绝支付超过法定最高利率的利息的观点过于绝对,实际上将债务的具体履行做同一化处理是困难的。

如果与盖尤斯《法学阶梯》记载的《马尔求斯法》结合起来,作为惩罚高利贷者的四倍罚金之诉的起源会变得清晰起来“但是,其他法律为某些情况规定了拘禁之诉,然而,是单纯的拘禁之诉,也就是说,不是为已决案规定的那种拘禁之诉;比如,《关于遗嘱的福流斯法》……针对放高利贷者的《马尔求斯法》也规定:如果某人收取利息,可以通过拘禁之诉要求获得返还。”^③可以通过单纯的拘禁之诉对抗有息放贷者要求返还利息。该制度作为要求返还已经支付的利息(不考虑是否超过法定利率)的工具,而不是诉诸四倍罚金之诉,是有意义的,这与《革努斯平民会决议》之后所呈现出的状况是一致的。

然而,诉诸单纯的拘禁之诉可能与阿斯科纽斯(Pseudo-Asconio)的说法有关,西塞罗在昆图斯·切其流斯的演说中是这样使用 *quadruplator*(获得四倍罚金的原告)一词的“也有人说,获得

① F. DE MARTINO 在其 *Riforme del IV sec. a. C.* 第 64 页中清楚地注意到,如果规定的最高利率是 100%,然后再降至 50%,并且在更早的时期需要将对借贷物的使用价值化的话,那么,就不能理解利率的降低减轻了平民的负担。

② 例如,对利率的干预并不导致借贷行为无效,参见 L. MITTEIS, *Römisches Privatrecht bis auf die Zeit Diokletians I*, 莱比锡, 1908 年(1994 年 Aalen 出版社重印), 第 248 页。

③ Gai. IV, 23. 在此,有不同的观点,参见 O. BEHREND, *Der Zwölftafelprozess. Zur 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Obligationenrechts*, 哥廷根, 1974 年, 第 209 页注释 9 和注释 10. 李维《罗马史》记载了罚金规则也扩张适用于与同盟者和拉丁人的借贷关系(Liv. XXXV, 7, 1-2,), 参见 DI LELLA, “Il plebiscito Sempronio del 193 a. C. e la repressione delle ‘usurae’”, 载 *Atti Acc. Sc. Nat. Pol.* XCV, 1984 年, 第 1 页及以次。

四倍罚金的原告是指控那些通常受到四倍惩罚(quadupli damnari)的被告的人,无论如何,高利贷者要承担较大的风险。”(布农斯,II,70)

我认为,四倍惩罚证明四倍罚金与一种惩罚(法定的?)有关^①,这种惩罚允许已经支付超过法定利息数额的“债务人”提起拘禁之诉对抗高利贷者。这也可以在普劳图斯的喜剧《波斯人》中使用的双关语的实际含义中找到证据:如果获得四倍罚金的原告向某人提起拘禁之诉/同样也允许他人向其提起拘禁之诉/允许他们平等地向法官起诉。

四、结论

规定高利贷者可通过放贷获取收益的市民法具有共同的抽象特征:抽象行为、仪式性(口头的和/或行为上的:誓约和债务口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文学性原始文献都承认平民通过债务口约而“负债”。家父们实施的称铜式行为受到市民法背后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样,习俗及对习俗的解释形成的规范,也对家父们实施的具有仪式性的市民法行为的效力产生了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为在法律上限制利率而诉诸于公法,平民会决议展示了市民法的一种“先天缺陷”。^[2]这也表明,求助于法律被认为是降低债务口约中的利息而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重新达至平衡的唯一理想途径。面对一个缺乏向心力的社会,在平民眼中唯一可以遏制高利贷现象的办法是诉诸公法,大部分情况下是诉诸平民的法律,以此作为与贵族停止斗争达成协议的尝试。正如已经谈到的,法律对利率的限制措施并不是宣布导致负债(此等负债通过债务口约对债务人的人身具有法律效力)的基础行为无效,而是授权债务人提起以“债权人”家父攫取的超过法定利息的金额为基础的四倍罚金之诉。

以债务口约作为借贷工具的实际利率不应当被抨击,而应当将其效力限制在通过公法或平民会决议课加给“债务人”的利率的范围内。对利率的干预不是宣布借贷行为无效,而是消除体现强势当事人一方意志的所谓“约定”利率的缺陷,遵守法律关于最高利率的规定,对攫取的超过法定最高利率的金额提起四倍罚金之诉。无论如何,对债务人更有力的保护通过拘禁高利贷者实现,起初拘禁的目的在于要求支付四倍罚金,《马尔求斯法》之后,单纯拘禁之诉的目的在于返还债务人已经支付的利息。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无论限制高利贷的法律还是平民为解决债务负担过重问题采取的其他措施(分期付款、延期支付等),都没有彻底解决债务负担过重的问题,也没有缓和与“负债”平民有关的社会紧张情势。因此,需要期待其他能够与导致“负债”行为结构相协调并且能够对债务问题给予更有效回应的法律解决途径。也就是说,需要期待《佩特流斯和帕皮流斯法》的颁布,李维在其《罗马史》(8,28,1)中将这部法律称为自由的另一个开始。根据权威的评价,这部法律开启了“债权和债权行为的新时代”。^[2]

(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史志磊译)

注释:

[1] [2] C. APPLETON,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u prêt à intérêt à Rome. Le taux du ‘fenus unciarum’”, *RHD*, 1919: 467 ss., in particolare 499; 534 ss.

^① F. SERRAO(*Diritto privato economia e società*, 第351页)认为,这种惩罚排他地属于对人的罚金法律诉讼,但高利贷与盗窃之间的对应关系可能为本文的解读提供进一步的论据。

- [2] F. VALLOCCHIA, “Manio Valerio ‘Maximus’, dittatore e augure”, *Index*, 2007: 27 ss.
- [3] L. PEPPE, *Studi sull’ esecuzione personale I. Debiti e debitori nei primi due secoli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Milano: Giuffrè, 1981, pp. 55 ss.
- [4] J. IMBERT, “Fides et nexum”, *Studi in onore V. Arangio-Ruiz*, I, 1953, pp. 360–362; M. I. FINLEY, “La servitude pour dettes”, *RHD*, 1965: 172–173.
- [5] B. ALBANESE, *Gli atti negoziali nel diritto privato romano*, Palermo: Università di Palermo, 1982, p. 34; F. SERRAO, *Diritto privato economia e società nella storia di Roma I. Dalla società gentilizia alle origini dell’ economia schiavistica*, Napoli: Jovene, 2006, p. 111.
- [6] G. BILLETER, *Geschichte des Zinsfußes im griechisch-römischen Altertum bis auf Justinian*, Leipzig: B. G. Teubner, 1898, pp. 160ss.; F. KLINGMÜLLER, “Streitfragen aus der römischen Zinsgesetzgebung”, *ZSS(RA)*, 1902: 68ss.; F. KLINGMÜLLER, “Fenus”, *PWRE*, 6(2): 2191–2192; O. BEHREND, *Der Zwölftafelprozess. Zur 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Obligationenrechts*, Göttingen: Otto Schwartz, 1974, p. 5.
- [7] R. SYME, *Tacitus 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8 (rist. inalt. 1993), pp. 397 ss.
- [8] P. CATALANO, “Princípios gerais do direito, direito à vida e dívida externa”, *Revista Forense*, 2001: 209 ss.; Ricardo Cardilli, “Fenus, usurae e interessi pecuniari come ‘frutti civili’”, P. CATALANO – A. SID AHMED (dir.), *La dette contre le développement: quelle strategie pour les peuples méditerranéens?*, Paris: CNES-ISPROM-PUBLISUD, 2002, pp. 15 ss.
- [9] G. BILLETER, *Geschichte des Zinsfußes im griechisch-römischen Altertum bis auf Justinian*, Leipzig: B. G. Teubner, 1898, pp. 117; F. KLINGMÜLLER, “Fenus”, *PWRE*, 6(2): 2188; S. RICCOBONO, *Fontes iuris romani antejustiniani. I, Leges*, Firenze: Barbera, 1941, p. 61; O. BEHREND, *Der Zwölftafelprozess. Zur 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Obligationenrechts*, Göttingen: Otto Schwartz, 1974, p. 5.; M. KASER, *Über Verbotsgesetze und verbotswidrige Geschäfte im römischen Recht*, Wien: In Kommission bei Rudolf M. Rohrer, 1977, pp. 35–36; D. FLACH, *Die Gesetze der frühen römischen Republik. Text und Kommentar*,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4, p. 180.
- [10] TH. MOMMSEN, “Dwdek& deltoj”, *Mél. Boissier*, 1903: 1–3; M. BRETONNE, *Storia del diritto romano*, Roma-Bari: Editori Laterza, 1995, p. 37.
- [11] M. BRETONNE, *Tecniche ed ideologie dei giuristi romani*, Napoli: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1984, pp. 8–9.
- [12] D. FLACH, *Die Gesetze der frühen römischen Republik. Text und Kommentar*,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4, pp. 283–285; F. SERRAO, *Diritto privato economia e società nella storia di Roma I. Dalla società gentilizia alle origini dell’ economia schiavistica*, Napoli: Jovene, 2006, pp. 346–349.
- [13] [2] F. SERRAO, *Diritto privato economia e società nella storia di Roma I. Dalla società gentilizia alle origini dell’ economia schiavistica*, Napoli: Jovene, 2006, pp. 348–349, 352.
- [14] P. CATALANO, “A proposito dei concetti di ‘rivoluzione’ nella dottrina romanistica contemporanea (tra ‘rivoluzione della plebe’ e dittature rivoluzionarie)”, *SDHI*, 1997: 440ss. , in particolare 447.
- [15] P. CATALANO, *Tribunato e resistenza*, Torino: Paravia, 1971; P. CATALANO, “Sovranità della multitudo e potere negativo: un aggiornamento”, *Scritti in onore di Gianni Ferrara I*, Torino: Giappichelli, 2005, pp. 641ss.; G. LOBRANO, *Il potere dei tribuni della plebe*, Milano: Giuffrè, 1983; F. SERRAO, *Diritto privato economia e società nella storia di Roma I. Dalla società gentilizia alle origini dell’ economia schiavistica*, Napoli: Jovene, 2006, p. 96.
- [16] G. ROTONDI, *Leges publicae populi Romani*, Milano: G. Olm, 1912, p. 224; M. KASER, *Über Verbotsgesetze und verbotswidrige Geschäfte im römischen Recht*, Wien: In Kommission bei Rudolf M. Rohrer, 1977, p. 36; L. SAVUNEN, “Debt Legislation in the Fourth Century BC”, U. PAANANEN et alii (ed. by), *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 Studies in Roman Republican Legislation*, Helsinki, 1993, pp. 143 ss.; F. SERRAO, *Diritto privato economia e società nella storia di Roma I. Dalla società gentilizia alle origini dell’ economia schiavistica*, Napoli: Jovene, 2006, p. 346.
- [17] G. ROTONDI, *Leges publicae populi Romani*, Milano: G. Olm, 1912, p. 226; F. DE MARTINO, “Riforme del IV secolo a. C. ”, *BIDR*, 1975: 65ss.; M. KASER, *Über Verbotsgesetze und verbotswidrige Geschäfte im römischen Recht*, Wien: In Kommission bei Rudolf M. Rohrer, 1977, p. 36; L. SAVUNEN, “Debt Legislation in the Fourth Century

- BC”, U. PAANANEN et alii (ed. by), *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 Studies in Roman Republican Legislation*, Helsinki, 1993, pp. 149–150; L. FASCIONE, “La legislazione di Genucio”, F. SERRAO (a cura di), *Legge e società nella repubblica romana, II*, Napoli: Jovene, 2000, pp. 179 ss., in particolare 182–185; F. SERRAO, *Diritto privato economia e società nella storia di Roma I. Dalla società gentilizia alle origini dell’economia schiavistica*, Napoli: Jovene, 2006, pp. 346, 349–350.
- [9] G. TILL, “. . . Postremo vetita versura”, *BIDR*, 1984: 147 ss.; F. SERRAO, *Diritto privato economia e società nella storia di Roma I. Dalla società gentilizia alle origini dell’economia schiavistica*, Napoli: Jovene, 2006, pp. 349–350.
- [20] PH. E. HUSCHKE, *Über das Recht des nexum und das alte römische Schuldrecht*, Leipzig: Gebauer’sche Buchhandlung, 1846 (rist. Aalen, 1980), p. 143; G. BILLETER, *Geschichte des Zinsfußes im griechisch-römischen Altertum bis auf Justinian*, Leipzig: B. G. Teubner, 1898, p. 218.
- [21] R. VON JHERING, *Geist des römischen Rechts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lung*, Leipzig: Breitkopf und Härtel, 1894 (rist. 1993), pp. 152–153.

责任编辑: 蔡永明

Class Struggle in the Roman Republic and the Legislation of and Anti-usury

[Italy] Ricardo Cardilli

(Law School, Rome University “Tor Vergata”, Rome, Italy)

Abstract: In the Roman Republic, anti-usu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nflicts between patricians and plebeians. In the beginning, the claim of plebeians is to liberate the debtors who fall into bond slavery because of default. Afterwards, plebeians enjoy *legis actio per manus iniunctionem* against usurers who violate restrictions on interest rate. The latter have to bear the punishment of quadruple fines. Recourse to the law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only satisfactory way to balance interests of parties involved. *The Law of the Twelve Tables* stipulates that the interest rate should not exceed 1/12. In 357 B. C., *The Plebiscite of Duilio Menenio* reaffirms the stipulations of *The Law of the Twelve Tables*. The plebiscite of 347 B. C. halves the permitted highest rate. Later, *The Plebiscite of Genucio* completely banned interest. These laws are mostly public laws enacted by plebeian legislature.

Key Words: ancient rome, roman republic, class struggle, anti-usury